

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商研究中心精品系列



# 自利性和公共性

浙商公共行为与政府公共政策

王春福 /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浙江省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浙商研究中心省重点研究项目  
(批准号: 09JDZS002Z)

# 自利性和公共性

浙商公共行为与政府公共政策

王春福 / 著



中国发展出版社  
CHINA DEVELOPMENT PRESS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自利性和公共性：浙商公共行为与政府公共政策/王春福著.  
北京：中国发展出版社，2012. 3

ISBN 978 - 7 - 80234 - 748 - 9

I. 自… II. 王… III. 商业企业—企业责任：社会责任—  
研究报告—浙江省 IV. F727. 5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272105 号

书 名：自利性和公共性：浙商公共行为与政府公共政策

著作责任者：王春福

出版发行：中国发展出版社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16 号 8 层 100037)

标准书号：ISBN 978 - 7 - 80234 - 748 - 9

经 销 者：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 者：北京科信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700 × 1000mm 1/16

印 张：23. 25

字 数：388 千字

版 次：2012 年 3 月第 1 版

印 次：2012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8. 00 元

咨询电话：(010) 68990642 68990692

购书热线：(010) 68990682 68990686

网 址：<http://www.developress.com.cn>

电子邮件：[fazhanreader@163.com](mailto:fazhanreader@163.com)

[fazhan02@drc.gov.cn](mailto:fazhan02@drc.gov.cn)

---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本社图书若有缺页、倒页，请向发行部调换

# 总 序

Foreword

三十年改革开放，华夏风云激荡；十万方浙江大地，浙商风生水起。

浙商是中国改革开放时代崛起最早、人数最多、分布最广的浙江企业家和商人群体。浙商的产生、发展、壮大，以及其做出的巨大贡献、取得的辉煌成就和面临的挑战，有许多需要探索解开的谜底，许多值得深入挖掘总结的经验，许多可以深入思考的学理，许多有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在改革开放之初，当改革目标尚不明确、经商对错亦无定论之时，浙商就在甬江南北、钱江两岸悄然形成，其中有浙北步鑫生的改革创举，有浙南“八大王”的悲怆故事，还有浙中义乌小商品市场的毁誉泣唱……

20世纪90年代初，乘邓小平视察南方讲话发表的春风，浙江涌现出以鲁冠球、宗庆后、徐文荣、南存辉、徐冠巨、李书福等为代表的一大批民营企业，浙商群体异军突起，越发引人瞩目。

到世纪之交，浙商所创造的温州模式、浙江模式不仅成为全国各地学习借鉴的典范，而且强劲地推动浙江区域经济发展，使浙江经济总量在全国的排位从改革开放前的中等水平迅速跃居第四。

进入21世纪，面对中国加入WTO、国内市场需求不足和企业融资困难等新情况，浙商跃出国门、冲向世界，在不到10年的时间里，使浙江成为中国外贸大省、百强县中数量众多的经济强省，自身也成为中国财富500强

中人数显赫的一个群体。

浙商不仅具有顽强的生命力，而且具有巨大的创新性。她为中国民营化、市场化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历史与现实贡献。而今，“三十而立”的浙商，投资播全国，财富遍天下，开始从青春爆发期步入成年稳健期。然而，前所未有的系列难题，如融资难、招工难、用地难、出口难、转型难、传承难等，又再次摆在浙商面前；改革滞缓造成的不合理制度政策环境，也使不少浙商的行为变形和扭曲，有的企业家蜕变成“弃业家”、投机客。

浙商何去何从？她是否会像历史上的徽商、晋商那样，只能成就一时的辉煌，还是可以浴火重生，成为“地球村”时代、市场经济条件下富有创新精神、与时俱进的现代商帮？新的时代背景和面临的挑战期盼着浙商能够做出新的回答，同时向我们提出了一系列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在特定时期、特定区域中某个特定商帮的兴起，肯定有天时、地利、人和等多方面的因缘际会。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浙江比较特殊的地理区位条件，义利兼顾的传统文化，勤劳智慧的老百姓，地方政府的顺势而为，可以成为解读浙商形成、壮大的要点。但是，我们仍然有许多值得仔细研究的课题：商帮的兴起需要哪些条件，具有怎样的发展规律和生命周期？前工业革命时期的晋商、徽商等商帮与工业革命以后崛起的浙商有何不同？市场的客观条件与变化、企业的组织形式与选择、政府的制度与政策，地区的传统与文化等等，它们是如何发挥各自的作用，并共同影响一个商帮的形成、发展、走向和命运？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中国地域辽阔，不同区域文化差异明显。当代浙商与其他区域的商帮，如粤商、苏商、鲁商、闽商等，有何异同，各有哪些优势与劣势？通过系统深入的比较研究，可以得出怎样的结论，获得哪些启发，并有助于推动各地商帮的现代化？

浙商是一个人数众多的庞大群体。她的地域（省内外、国内外）分布、行业分布有何特征，具有怎样的变化趋势？她的构成来源，年龄、性别、学历结构和产业选择，有何变化规律？

浙商商会（行业协会）尤其是外埠的商会具有什么样的组织特点和功能？商会对于浙商的发展壮大具有何种作用，应当如何更好地发挥作用？

如从个体着眼，浙商则是千姿百态的。他们有不同的家庭与职业出身，不同的创业经历，不同的经营理念，不同的人生境遇、追求与命运，有的若灿烂的流星，有的如持久的恒星。他们中的每一位，无论是成功还是失败，是持续还是退出经营活动，都可以从多个学科维度——管理学、经济学、文化学、政治学、法学、心理学、史学等——进行考察。这种考察分析深入持续下去，相信对于相关的学科领域的发展及其本土化，有不可忽视的作用，同时也会为今后新生代企业家的成长提供宝贵的经验教训。

着眼于当下，浙商应当如何突破各种瓶颈制约，实现行业选择、经营管理和企业组织的转型升级？应当如何实现省内浙商和省外浙商的比翼双飞、合作双赢？政府如何在制度环境、经济政策方面促进浙商的转型升级，进一步推动浙商的创新创业，吸引外埠浙商回归反哺浙江经济社会的现代化发展？

综上所述，浙商研究，论题多多，机会多多，而难度和挑战也是不小的。只要我们精心组织，理论与实践密切结合，从各个角度、不同学科深入地系统地调查研究浙商，相信既可推进理论的发展，又可指导浙商的现代转型，还可为政府科学制订政策提供理论依据。

依托浙江工商大学建立的浙江省浙商研究中心是浙江省首批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之一，于2006年批准成立，已经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成为浙商研究颇有影响力的“重镇”。现在，我们组织浙商研究中心内外的研究力量，精选论题，将陆续推出的这套“浙商研究中心精品系列”，就是试图为实现以上目标做出的新贡献。

是为序。

张仁寿

2012年3月

# 目 录

Contents ▾

<b>第一章 导 论</b> .....	1
<b>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b> .....	1
<b>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内涵解析</b> .....	7
<b>第三节 国内外相关研究综述</b> .....	12
<b>第四节 理论基础与研究结论</b> .....	39
<b>第二章 浙商公共行为研究的理论预设</b> .....	55
<b>第一节 浙商公共行为的人性假设</b> .....	55
<b>第二节 浙商公共行为的分析框架</b> .....	71
<b>第三节 浙商公共行为实现的构想</b> .....	78
<b>第三章 浙商与公共行为的历史演进</b> .....	85
<b>第一节 西方公共行为的历史演进</b> .....	85
<b>第二节 中国商人的历史与公共行为</b> .....	103
<b>第四章 浙商公共行为与经营行为</b> .....	113
<b>第一节 浙商的经营行为</b> .....	113
<b>第二节 浙商公共行为对经营行为的影响</b> .....	121
<b>第三节 浙商经营行为对公共行为的影响</b> .....	127

<b>第五章</b>	<b>浙商参与公共产品供给</b> .....	134
第一节	浙商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现状 .....	134
第二节	浙商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价值 .....	146
第三节	浙商参与公共产品供给的走向 .....	153
<b>第六章</b>	<b>浙商参与公共权力运作</b> .....	159
第一节	浙商参与公共权力运作的现状 .....	159
第二节	浙商参与公共权力运作存在的问题 .....	173
第三节	浙商参与公共权力运作的发展与展望 .....	179
<b>第七章</b>	<b>浙商参与公共精神积淀</b> .....	189
第一节	浙商参与公共精神积淀的内涵与演进 .....	189
第二节	浙商参与公共精神积淀的现状与治理 .....	199
第三节	浙商参与公共精神积淀的发展与未来 .....	209
<b>第八章</b>	<b>浙商参与公共领域建构</b> .....	215
第一节	浙商参与公共领域建构的内涵与演进 .....	215
第二节	浙商参与公共领域建构的现状与治理 .....	226
第三节	浙商参与公共领域建构的发展与未来 .....	235
<b>第九章</b>	<b>浙商公共行为与公共治理</b> .....	240
第一节	浙商公共行为与公共治理的关系 .....	240
第二节	浙商公共行为与公共治理的模型 .....	251
第三节	浙商公共行为与公共治理的机制 .....	256
<b>第十章</b>	<b>浙商公共行为的制度生态</b> .....	265
第一节	浙商公共行为与制度生态的关系 .....	265
第二节	浙商公共行为与制度生态的保障 .....	274
第三节	浙商公共行为与制度生态的缺陷 .....	288
第四节	浙商公共行为与制度生态的优化 .....	294



<b>第十一章 浙商公共行为的政策导向</b> .....	303
第一节 浙商公共行为相关政策发展过程 .....	303
第二节 浙商公共行为的政策需求 .....	316
第三节 浙商公共行为的政策完善 .....	323
<b>第十二章 浙商公共行为的时代意义与未来</b> .....	336
第一节 浙商公共行为的时代意义 .....	336
第二节 浙商公共行为的未来趋势 .....	342
<b>参考文献</b> .....	349
<b>后 记</b> .....	357

# 第一章 导 论

浙商主要是指当代浙商，是伴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生产资料所有制关系重大调整而崛起的浙江商人群体。浙商的发展得益于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制度设计，也得益于地方政府的政策扶持。浙商作为新兴的、颇具实力的投资者和经营者群体，不仅对经济发展发挥了巨大的推动作用，而且以其公共行为在公共治理中也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

## 第一节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 一、研究的背景

#### （一）历史背景

自利性和公共性是人类本性的两个方面。在古希腊和古罗马时期，人的公共性比较充分地显示了自身所具有的重要的意义。而到了中世纪，在宗教神学的奴役下人的本性由于被扭曲而苦苦挣扎，禁欲主义压抑了人的自利性，公共性被宗教神学异化为神的特性。伴随着启蒙运动对人性的呼唤，人的本性开始回归。启蒙运动的思想家们用“人性”取代“神性”，用理性崇拜取代宗教偶像，用“天赋人权”否定“君权神授”，用自由对抗暴政，用人生而平等反对封建等级特权，恢复了人的价值，彰显了人的本性。伴随着启蒙运动的呼唤，是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主体性的回归。人的主体性的确立，使人释放出空前的能量：人们相信自身可以无往而不胜，能够征服一切对象；人们相信理性是万能的，可以获得一切知识。人性的张扬冲破专制的束缚，以人的自利性为基础形成了积极的个人主义，成为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内在动力。启蒙运动呼唤人的理性，张扬人的个性，关注个人的自由和权利，使人性中的自利性不断强

化，从而也遮蔽了公共性的一面。启蒙运动的意义在于通过对人的理性的呼唤和个性的张扬，充分显示了人的自利性对实现经济繁荣的积极意义，推动了人类社会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加快了现代化的步伐。但是，相伴而来的是人的公共性的逐渐失落，以至于几乎使人类丧失了公共生活的价值。人类在对启蒙运动以来所走过的历程进行反思的过程中，开始重新审视公共性的意义，使21世纪成为呼唤公共性的时代。民营企业通过其公共行为由自利性不断地向公共性展开，恰恰适应了这一历史发展的大趋势。

人性中自利性与公共性的矛盾，在公共治理活动中，主要通过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来展现。近代以来，在市场经济大发展的推动下，政府、市场和社会的矛盾也逐渐彰显出来，使正确处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成为公共治理的永恒主题。企业，特别是民营企业的发展壮大，重构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关系。在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上，亚当·斯密主张更多地诉诸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结果由于市场自身的缺陷，导致了周期性的经济危机，市场失灵了。凯恩斯则强调应发挥两只手的作用，尤其青睐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随着政府职能的不断膨胀，结果政府也失灵了。政府不仅不能解决问题，而且成了问题本身。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要在公共治理中引入市场机制，收缩政府的职能，重新诉诸市场以解决政府失灵问题。金融危机的爆发暴露了新公共管理治理模式的诸多问题。在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双重压力下，是否可以诉诸于社会，然而，社会是否也会失灵，回答应该是肯定的。社会之所以也存在失灵的可能，原因在于社会资源在不同群体之间的非均衡分布。社会是分为不同阶层和群体的，由于他们占有的社会资源不同，组织化程度不同，社会影响力也不同，因此为本阶层和群体谋取利益的能力也存在差异。不同的阶层和群体由于受自利性的影响，都存在着为本阶层和群体争得更多利益的冲动。组织化程度比较高的阶层和群体，往往会比组织化程度比较低的阶层和群体能够为自身争得更多的利益。在政府和社会的关系上，政府象征着秩序，而社会则需要更多的自由。哈耶克强调自由的绝对意义，亨廷顿则认为秩序比自由更重要。是管理多一些，还是服务多一些，政府和社会在强与弱的不同组合中进行着力量不均衡的博弈。政府和社会是否可以同在公共理念之下，通过平等协商来解决公共治理中的问题？人们在苦苦追寻，探求公共治理的新模式。游走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无非是要寻找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最佳结合点，以摆脱各种“失灵”给人类带来的烦恼。这种最佳结合点在逻辑上可以成立，但在实践中

只能无限地接近。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最佳结合点就是它们的完全融合，到那时三者的矛盾消失了，政府、市场和社会的分野也就失去了意义。

事实上，寻求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最佳结合点，归根结底是寻求解决自利性和公共性矛盾的根本途径。从“应然”的角度来说，政府行使的是公共权力，应代表公共利益，体现为公共性。但从“实然”角度来看，政府也没有摆脱自利性的纠缠，更多地关注自身利益是导致政府失灵的根本原因。政府公共性的回归是政府克服自身失灵的根本前提。“理性经济人”假设揭示了市场主体的根本特征，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成为推动市场主体逐利行为的根本动力，然而，市场主体的自利性也是造成市场失灵的罪魁祸首。当然，即使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市场主体也具有公共性的一面，这是克服市场失灵的积极因素。当社会不同阶层和群体出于自利性力图为本阶层和群体谋取更多利益的时候，这里的自利性已经不是纯粹意义的自利性了，它已具有了一定的公共性特征。因此，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社会是由自利性向公共性过渡的桥梁和纽带。要想接近政府、市场和社会的最佳结合点，就必须不断提升各自的公共性。这依赖于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民营企业的公共行为恰恰为政府、市场和社会的良性互动提供了重要的前提条件。

## （二）国际背景

对浙商公共行为与政府政策导向的研究，是在特定的国际背景下进行的，这也赋予了浙商公共行为以特殊的意义。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世界经济进入了新一轮的衰退期。尽管从2009年第三季度起世界经济结束衰退，并于2010年基本确立了复苏的态势，后金融危机时代或已到来，但是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远没有结束。世界经济还存在着新一轮探底的可能。这不仅影响世界的经济格局，也影响着世界的政治格局和治理结构。浙商创办的企业以外向型企业居多，世界经济格局的新变化，事实已经证明，对浙商的发展造成了非常大的影响。

伴随着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到来，加上其他复杂因素的影响，国际经济、政治局势都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一是世界经济增长和市场需求发生新变化。世界经济不确定性仍然较大，国际金融危机的深层次影响依然存在，各国经济复苏仍不均衡，贸易保护主义有所抬头。主要发达国家失业率居高不下、消费不振，房地产、金融等支柱产业在危机中受到重创，新的经济增长点短期内还难以形成。一些国家政府负债过高，财政收支矛盾突出，其潜在危害和影响不容

小视。特别是一些主要经济体为刺激本国经济复苏，持续实施扩张性货币政策，大量投放流动性，可能会引起国际金融市场的动荡，推动能源资源等大宗商品价格上涨；热钱的涌入也会对新经济体发展带来冲击。与此同时，世界范围内经济结构重组引人关注。一些发达国家开始倡导储蓄、鼓励出口并支持实体经济发展，试图解决财政赤字和政府债务过高、经济‘虚拟化’等问题。有的发达国家还实施扩大出口战略，推行产业回归和制造业再造，力求改善贸易失衡状况。世界经济缓慢增长，全球需求结构明显变化，对我国稳定和拓展外需、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形成新的压力，也对我们在内需和外需的平衡中把握机遇、应对挑战提出了新的要求。二是科技创新和产业升级孕育新突破。国际金融危机催生新的科技革命，世界可能进入创新集聚爆发和新兴产业加速成长时期，绿色发展成为一大趋势。不少发达国家在应对危机中提出‘绿色新政’，制定未来发展战略，大幅增加研发投入，支持新能源、生物医药、信息网络等领域创新发展。全球范围内，绿色经济、低碳技术等正在兴起，抢占未来发展制高点的竞争日趋激烈。在有些领域，新兴经济体与发达国家的差距相对较小。在这样的背景下，只要我们把握趋势、应对得当，就可能抢占先机、赢得优势，推动实现跨越式发展。否则，就会贻误时机，难以实现赶超，甚至陷于被动和落后。三是国际治理结构出现新调整。经历金融危机的洗礼，国际社会积极推动全球治理结构和金融监管制度改革。通过改进和完善已有架构，形成一个有利于兼顾公平和效率的全球治理体系，以反映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已成为各方共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治理结构调整已经实施或正在推进，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话语权有所增强。各国围绕气候变化、能源资源安全、粮食安全、公共卫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的合作与博弈强化，牵动着国际关系调整演变和国际力量分化组合。如何适应国际政治经济格局变化，趋利避害，有所作为，是我们面临的新课题。”<sup>①</sup>这一切都为浙商的发展提出了新要求，使浙商转型升级的任务迫在眉睫。

### （三）国内背景

从国内来看，我国正处于社会结构转型的关键时期。所谓社会结构，就是社会各种构成要素之间所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主要包括社会经济结构、社

<sup>①</sup> 李克强：《深刻理解〈建议〉主题主线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民日报》2010年11月15日。

会职业结构、社会分配结构、社会阶层结构、社会组织结构、社会行为结构、社会价值结构。社会结构转型通常是从社会经济结构的变迁开始，由此引发了社会职业结构和社会分配结构的转变，这必然带来社会阶层结构的变化。伴随着社会阶层的分化，重组社会的阶层结构势所必然。随着不同社会阶层组织化程度的不断提高，也带来了不同社会阶层组织化程度上的差异，形成新的社会组织结构。这一切，或迟或早地要改变社会的行为方式和重构社会的价值体系，使社会转型向更深层次的社会文化结构转型推进。社会结构转型对社会的影响是全面的、深远的，带来的是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所有领域全方位的系统重构，使经济发展和社会结构变化呈现出许多新的特点。

改革开放这30多年，恰恰是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步伐加快的时期，而且，结构转型同体制转轨相交织形成了一种力的叠加，冲击着人们传统的观念和传统的行为方式。在我国现阶段，社会转型是与新兴工业化道路相联系的社会结构变革。这场变革也是同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转轨相联系的制度和体制上的变革，由此引起的社会结构的变动空前复杂。尽管我国由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已接近尾声，总体上已经进入工业社会，但这种转型所带来的影响还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与此相伴随的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大门已经开启，为社会结构转型增添了新的内容，也带来了新的矛盾。随着社会结构转型步伐的不断加快，社会矛盾也会突显出来。

30多年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正在崛起。民营企业家阶层从小到大，由弱到强，在国家经济社会发展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伴随着这个阶层的成长壮大，他们在不断扩大经营规模，提升经营层次，以谋得更多的自身利益的同时，在公共事务领域也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他们投资于公共产品领域，既扩大了企业的经营范围，也弥补政府财政资金的不足；他们参与公共权力的运作过程，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以影响政府的公共政策；他们履行社会责任，开展慈善活动，弘扬公共精神；他们组织民间社团，构建公共领域，为公民社会的培育和发展不遗余力。民营企业家阶层无论是在经济、政治，还是文化和社会领域，都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伴随着经济力量的增长，他们的政治要求也越来越强烈。他们以自身占有的资源活跃在社会的大舞台之上，正在上演着从配角到主角的历史活剧，并在不断显现着自身的影响力，已经成为政府乃至全社会都必须认真对待的一个阶层。他们在同政府通过各种途径的互动中，争取话语权，对政府公共政策的

影响不可低估。这30多年也是浙商兴起和发展的重要历史时期，从目前来看，浙商已成为民营企业家中，最具影响力的群体。为了使这一阶层更好地发挥其应有的积极作用，政府也必须通过公共政策予以正确引导，不断提升其公共行为的公共性。

这30多年，从全社会来看，经济的发展带来了收入水平的提高。伴随着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消费结构将持续升级，从而拉动了投资结构和产业结构的升级。目前，在经济快速增长变动中，经济结构升级的约束逐步增多，整个社会结构平衡的难度也在不断加大，经济转型的进程中存在不少需要解决的矛盾和问题。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尽管中国经济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后，率先走出低谷，但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任务还很艰巨。伴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民群众对提高生活水平和质量有了新期待。群众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后，对提高生活水平和改善生活质量的愿望明显增强。近些年来，尽管我国社会事业有了很大进步，但总体上依然滞后于经济发展，仍是现代化建设中的一块‘短板’。在就业、教育、住房、医疗卫生、环境保护、社会保障等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领域，还存在不少难点和焦点问题，基本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公平性仍然不够。社会主体的多元性、独立性、选择性增强，而社会建设还不到位，经验缺乏，人才也不足。这些都与人民群众对过上更好生活的新期待有较大差距。”<sup>①</sup>调整经济发展结构，改善民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已成为后金融危机时代我国面临的主要任务。伴随着国内经济发展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既为浙商的发展带来了挑战，也带来了机遇。浙商创办的企业从总体上看还是以中小企业为主，目前中小企业的发展面临诸多困难。适应经济发展结构战略性调整和改善民生，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需要，积极参与公共产品供给可能成为浙商转型升级和进一步发展新的增长点。2010年5月国务院出台了《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称为“新36条”，几乎向民间资本开放了所有的公共产品领域，为民间资本参与公共产品供给敞开了大门。但民间资本真正进入还需要出台一系列的配套政策，打破事实上的垄断问题。这就需要浙商积极参与公共权力的运作，通过各种形式同政府进行积极的互动，表达自己的政策需求。在这一过程中，民间商会要发挥

<sup>①</sup> 李克强：《深刻理解〈建议〉主题主线 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人民日报》2010年11月15日。

自身应有的作用，使政府能够真正为浙商公共行为营造良好的制度生态和政策环境。

## 二、研究的意义

在金融危机的影响下，浙商的发展也一度陷入困境，促使其将全部的精力倾注于企业的经营活动，公共行为被弱化。当浙商从金融危机的阴影中走出之后，其公共行为就具有进一步展示的条件和空间。浙商如何顺应后金融危机时代的呼唤，强化其公共行为，政府如何为浙商的公共行为提供相应的政策环境，是一个非常值得探讨的问题。之所以要探讨浙商公共行为的政策环境问题，可以肯定的回答，在相应的政策环境的作用下浙商的公共行为会进一步地展现出来。因为公共性毕竟是人性中的一个重要方面，更何况改革开放以来浙商的发展同公共性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浙商发展的初始阶段恰恰得益于公共权力的无为而治，为其发展留下的广阔空间。

随着浙商的发展与壮大，浙江商人的影响力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越来越多的浙商将他们的目光投向公共事务领域，例如，参与地方公共产品的供给，支持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积极进行政治参与，加入人大、政协、政党等组织；对社会的弱势群体开展了慈善捐助；促进民间商会、行业协会的成长与发展，等等。但由于受金融危机的影响，浙商的发展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然而，浙商在转型升级中迎接后危机时代的到来，正在重新崛起，其公共行为必将成为浙商进一步发展的取向之一。

由于一方面浙商自身存在着认识上的局限性、利益上的趋向性，另一方面由于传统政府职能的限制，政策法规的配套等问题，使得浙商的公共行为具有自发性、不稳定性等特点。因此，研究浙商的公共行为，为提升其公共行为的公共性提供制度上的保证和政策上的引导，无论是对浙商自身的发展，还是对我国搞好公共产品供给、推进民主政治建设、促进精神文明、发展公民社会，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都具有重大的理论和实践意义。

## 第二节 相关概念的内涵解析

### 一、浙商内涵解析

在当代中国，浙商无疑是人数最多、分布最广、实力最强的一个投资者、



经营者群体，是推动浙江经济发展和创造“浙江现象”的主力军，其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都已远远超越省域范围。<sup>①</sup> 浙商是对浙江商人群体的一种称谓，既包括浙江民营企业的创办者，也包括从浙江走出去的在全国各地乃至世界各地创办企业的浙江商人。这里所说的浙商主要是指当代浙江商人，他们是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成长起来的民间商人。根据浙江省工商局公布的数据，截至2010年6月底，全省私营企业总数已达到60.47万户，首次突破60万大关；注册资本总数达14835亿元。浙江省还有160多万个体劳动者。浙江省个私经济总产值、社会消费品零售额、出口创汇额等指标连续多年居全国第一。

浙商是浙江人中的商人。“浙江人”主要是由两类人组成，一类是指有浙江血统、籍贯和文化基因的人；另一类是指虽然没有浙江血统、籍贯和文化基因，但生活在浙江和融入浙江的自然和人文环境中，并认同浙江文化的人。很多人尽管不在浙江出生，但他们长期居住在浙江，生活在浙江，喜欢浙江的山水自然和社会人文，融入浙江社会和认同浙江文化，认定自己是浙江人或新浙江人。这后一类人在浙江人中占有相当的比例。<sup>②</sup> “商人”通常是指做买卖的人。据有关学者考证，之所以把做买卖的人称为商人，可以追溯到殷商时期。在商朝繁盛时期，一部分商族人经常到周边民族地区以农贸产品互换方式进行买卖，在外族人心目中，做买卖的就是商族人。商朝灭亡后，商族人做买卖的就更多了，虽然后来随着历史的发展，买卖人已不再以商族人为主体的，但人们仍习惯把“商人”作为买卖人的通称，而且一直延续至今。如果给商人做一个界定，商人是指以一定的自身或社会有形资源或无形资源为工具获取利润并负有一定社会责任的人，或者是指以自己名义实施商业行为并以此作为常业的人。

浙商作为一个群体，不仅仅是指做买卖的生意人，也包括创办企业的企业家。他们具有商人的一般属性或共同特征，也有自身的特殊性。浙商既表明他们与历史上的晋商、徽商相区别，也表明他们与当代的粤商、闽商、苏商、鲁商、京商等相区别的特性。勤奋、务实、和合、功利，敢为天下先，善于夹缝中求生存的草根精神，可以在一定意义上反映浙商的特点。正是由于其固有的特点，使浙商

<sup>①</sup> 张仁寿、杨铁清：《浙商：成长背景、群体特征及其未来走向》，《商业经济与管理》2006年第6期。

<sup>②</sup> 吕福新等：《浙商论》，中国发展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